

評 尋求富強與嚴復與西方

郭正昭

(一)

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嚴復無疑是一位偉大的宗師。他在清末民初之間，譯介了一系列十九世紀西洋的重要名著，開啓了那個世代國人對西學，尤其是西方傳統的倫理、民主與科學思潮的基本認識，對民國以後中國社會文化的變遷和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關於嚴復的傳記，直到目前為止，已出版而比較完整且深刻的著作，首推周振甫的「嚴復思想述評」、王棡的「嚴復傳」及史華茲 (Benjamin Schwartz) 的「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這三本傳記的作者各代表一種世代，各有其思想背景

，也就各自表現了一種歷史的視野和評判的極限。就筆者的偏見，這三書之中，史華茲在西方社會文化思想的基礎上，謹嚴而精密地探析了嚴復的思想本質，並追溯其源流，允推為最成功的經典之作。這本由哈佛大學出版的嚴復傳，最近經此間沈文隆先生譯出，並由長河出版社出版了。

(二)

這篇書介的題旨，主要的想簡約地評述一下，史氏著作的某些見解，並提出個人一點補充的看法。這裏不妨先就周、王二書的內涵和他們對嚴復生平的論斷，做一個引申。周振甫在其「嚴復思想述評」中，把嚴復一生思想成長和變遷的歷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全盤西化」、「中西折衷」與「反本復古」。周氏認為：嚴復第一期思想的核心就是「全盤西化」。嚴復提出了「力今勝古，世日進也」的進步哲學來矯正中國崇古的錯誤觀念，因此他提出了中國治化的粗淺，學術和政教的混亂而未分的流弊。又提出中國的名學不發達，只重演繹而不重實測的歸納，所以多「心成」之說。不但九流的學術靠不住，就是儒家所標榜的重仁義和反功利的見解也不合真理，那只是「率天下而禍仁義」。這種話在當時的確是很前進，而且是激烈的反傳統傾向的主張。不過嚴復一方面却又相信孔、老的教訓裏含有不變的「道」，又說中國古書裏包藏着許多真理，即連力學、演化論、歸納和演繹等科學方法都在中國的經典裏可以尋索出一個脈絡，而這些知識反而在讀外國的著作時，才闡述和印證得出來。周氏進一步評論嚴復在所謂「全盤西化」時期的思想價值，認為嚴復在該一時期內對西洋文化批判的接受，和中國文化批判的否定，都足以矯正當時人的錯誤思想，領導他們走向前進的道路。對於義理、考據、詞章、八股的排擊，對於自由、平等的大聲疾呼，確是對舊思想有摧陷廓清的功勞，尤其對西方思想的系統化的介紹，科學方法的提倡，不僅僅做了一點對舊思想破壞的功夫，並且還建立了一種新思想。周氏遺憾地指出了嚴復這個階段性的努力，因他既不贊成革命而落空了。因為這一切西化的主張，不可能依靠中國數千年的教化養成「止足」、「泯爭」的百姓去實踐力行，而滿清政府的守舊自私，又豈有可能提倡民權，實行立

憲呢？

周氏認為嚴復到了「中西折衷」與「反本復古」時期，就逐漸趨向保守了。此中道理，主要還是因為他的思想越接近了現實。嚴復這時看到中國國民程度的不足，不再講民治了。他看到急進的無當，不再喊否定中國的一切了。他看到西方文化的弱點，不再唱全盤接受論了。他要求中國的統一，他要求中國的法治，他主張根本在教育，這些都更現實地適合中國當時的迫切要求。他主張保存中國固有文化，並且用科學方法來加以淘鍊，這是闡揚中國文化一個正確的方向。周氏認為，嚴復晚年的思想傾向，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第一，他看到中國國民程度的不適於共和，於是他就反對自由平等而主張回到專制。第二，歐戰的罪惡是帝國主義必然的結果，並不是科學的罪惡，也不是民主的罪惡。嚴復不推求其中緣故，却因歐戰的悲劇而一筆抹殺了西方文化的價值。其實，如果說嚴復的思想是由早年的激進而趨向晚年的保守，恐怕並非很恰當的論斷。問題的關鍵在於對「激進」或「保守」等概念的明晰界定。「反資本主義」是「激進」還是「保守」呢？嚴復於光緒年間繼「天演論」之後而翻譯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一部極典型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的開山之作。但是他對該書的許多資本主義的意理觀念提出了批判。他相當透澈地看到，西方資本主義的繁榮不是真正的繁榮；生產過剩和市場的競爭的嚴重禍害，歐戰爆發及其接踵而至的世界經濟蕭條，才把一般人信仰資本主義的迷夢逐漸打破了，而嚴復晚年反資本主義的傾向，其實在他翻譯「國富論」時，即深植了他的思想根源的。從這一脈絡看來，嚴復的思想變遷，並非像周振甫所推論的那樣單純地由激進而保守。

(三)

另一位「嚴復傳」的主要作者王拭則更進一步，批判嚴復晚年的思想趨向，不僅是保守，簡直是「頑固」和「反動」了。他論定嚴復是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啓蒙思想家。他認為，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他們在「救亡圖存」的口號下，開展了變法維新運動。在這個時期，嚴復辦報紙

，寫文章，翻譯西方學術著作，成為提倡變法自強的出色的理論家和宣傳家。他積極提倡新學（西學），猛烈批判舊學（中學）；積極提倡資產階級民主，猛烈反對封建君主專制。嚴復當時翻譯並加按語的「天演論」，和他在報刊上所發表的一系列論文，大力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大聲疾呼變法自強，在當時社會起了重大的影響，為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敲起警鐘。

王氏在其有關嚴復生平著述中，幾乎完全以經濟決定論和階級決定論的觀點來分析並評判嚴復的歷史地位。他說，嚴復的思想代表當時中國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反映了這個階級外爭獨立，內爭民主，積極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要求。因此，在針對現實的具體主張上，嚴復思想與古代法家思想有不同的階級內容，但在哲學思想上，却很相似。尤其在輸入西學與新學的這一點上，嚴復在當時，不愧是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中國人。在戊戌政變後至辛亥革命前的十三年中，嚴復以最大精力從事於西方資產階級名著的翻譯。與翻譯「天演論」一樣，他也往往在譯文後面加上自己的按語，用以發揮自己的見解。嚴復在這十多年中的翻譯及著作，對當時社會，客觀上還是起了啓蒙作用。

但是，嚴復沒有能够始終如一地堅持革新與進步。戊戌變法失敗後，他雖然仍在大量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思想，但是已經漸趨保守。到辛亥革命以後，他背叛了戊戌變法前後推動歷史車輪前進的自己，成了開歷史倒車的保守派，政治上反對共和，主張帝制，思想上也由尊法反儒，轉為尊孔讀經，隨着革命的高漲，嚴復思想中先進的東西逐漸銷蝕，而落後反動的東西則愈益膨脹，最後就使他成為頑固分子。嚴復由進步轉向保守，決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代表的資產階級上層，具有嚴重的妥協性之外，主要是自己的思想中了庸俗進化論的毒害（關於這一點，王栻有精細的討論），沒有不斷前進，跟上時代的步伐。王氏最後從當時階級和歷史條件，指出嚴復思想的局限性，說不是苛求於他，而是使人理解，從而吸取有益的歷史教訓。

(四)

且讓我們回到本文的主題，亦即哈佛學者史華茲在其「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一書中，對嚴復生平思想的幾個重要的論斷，以及筆者對這些論斷的一些評述。史氏此書共分十二個章節：1、緒論，2、嚴復的早年生涯，3、嚴復的思想理論，4、西方思想的本質——「天演論」，5、嚴復與「原富」，6、嚴復與「羣己權界論」，7、嚴復與「法意」，8、嚴復與「社會通詮」，9、嚴復與「穆勒名學」，10、嚴復評點「老子」，11、嚴復的晚年生涯，12、結論。從本書的結構裏，可以明顯地看出，史氏剖析的主要角度，乃是透過西方名著的譯述的精細過程來探討嚴復思想的整體面貌及其內在的本質。史氏對嚴復生平思想的一個中心概念是：不僅嚴復早期思想裏的權威主義，自由與激進的色彩，可以判定是從西方來的；就是嚴復晚年的政治保守趨向，也仍舊守住西方的觀念，未必是反動，而且也沒有回歸到中國古老的傳統。

嚴復一生的思想主題是尋求中國的富強之道，這一觀點可以從他的所有著述中呈現出來。因此說嚴復早年是「全盤西化者」，或者說他是「反傳統者」，都不是精確的論見。「中國傳統」涵蓋的範疇極為弘深奧博，也自成一套完善的理論系統，嚴復當然不會去駁斥，而他在老子、荀子、佛經，以及易經的學說裏面，更可以尋求其維新的理論根據。史華茲又認為，嚴復既然深切瞭解東西文化的類似，因此他不會是文化的「相對論」者，懷抱着孤立的，封閉的觀念。嚴復服膺斯賓塞（H. Spencer）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但也維護傳統，這是因為斯賓塞的「形上宇宙論」，很能配合中國古先哲的思想，而且把「絕對宇宙論」——即一切事物皆源自「不可知」，而以空間、物質、時間、運動及力量等各種方式呈現出來——亦即藉着易經、老子或宋代理學的精義，把這些學說闡釋出來。

史氏從這個角度上展開了對嚴復思想整體性的分析。他強調嚴復思想的西方淵源，而關鍵人物則為斯賓塞。斯賓塞不僅指出了「絕對宇宙論」，也提出了「社會有機論」，指出社會的病態，以及針對這種病態應有的解救之道。嚴復認為中國幾乎是以社會為中心的國家，其組織如同生物的構造一般，乃是一種「有機體」（斯

賓塞在其「社會學原理」中，把這種社會有機體的觀念闡釋無遺。社會和生物一樣，都是有機體，對嚴復來說，是一個很新奇的觀念。這種觀念，在盛行「個人主義」的西方，可以追溯到希臘羅馬時代，至霍布士（Thomas Hobbes）時，已經很普遍了。斯賓塞源用於此，再加上進化論，就成為他自己的理論了。嚴復終其一生，相信這個人類彼此互相依賴，互求生存，社會有機體的觀念。他有一段很重要的闡釋的話說：「且一羣之成，其體用功能，無異生物之一體，小大惟宜而官治相準。知吾身之所以生，則知羣之所以立矣；知壽命之所以彌永，則知國脈之所以靈長矣。一身之內，形神相資；一羣之中，力德相備，身貴自由，國貴自立。」同時斯賓塞以心理學的觀點來說「社會有機論」，認為社會羣體乃是由個人組成。社會羣體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是嚴復一生所思考的一個中心主題。

史華茲從社會有機論的觀念，進而探析了「自由主義」的本質。從嚴復發表的文章上，我們知道，他曾極力倡導「西方的自由主義」，而斯賓塞是十九世紀英國自由主義的典型。斯賓塞的社會觀認為，社會是由個人組合而成，而個人都具有潛能——包括民力、民智與民德等方面。個人為了追求幸福，乃將這些潛能發揮到了極致。所謂「自由」，即個人能力的充分發揮，從前對個人潛能的種種限制，今天已經能夠藉着制度和觀念的形成和保障而加以發揮了，而其動機乃是為追求個人的利益。斯賓塞的自由主義論即以此為出發點，並綜合傳統的經濟觀念和達爾文的進化論而成。嚴復從這個角度進一步加以闡揚，因此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而其先決條件，乃是要先塑造一個自由、平等與民主的環境。

史華茲從光緒二十一年至光緒三十四年，嚴復所發表的譯著和文章中，深刻地探討了他的思想動態。周振甫表示嚴復早期是一位「全盤西化論者」，以後漸漸成為「保守傳統論者」。史氏不同意這個看法，他認為嚴復竟其一生，始終維持了一個中心意旨，思想本質是一貫的。我們從他在光緒二十一年發表的文章及「法意」等書的案語及評點老子的文字中發現，他曾對傳統的價值提出新的見解與批判。在庚子事變之前，嚴復對政治的立場完全採取保守的態度，但並不意謂他是一位「傳統主義者」，而且在他早期翻譯「天演論」的案語中，

他又明顯地贊揚傳統的思想。

史華茲進而申論了另一個觀點，而對嚴復晚年與洪憲帝制的關係一段為後世史家普遍詬病的公案，提出了辯解。他認為嚴復所關懷的，是中國現代化與社會理性化的工作，而不是單純的自由平等的價值觀。民國以前，嚴復為了促進中國工業、軍事、政治與法律制度的現代化，一再強調科學與教育的功能。在西方由於「理性化」的提倡，自由、平等和民主都能相輔相成，共同導致了國家的富強。但對中國來說，却必須分清本末輕重緩急，不是一蹴可幾的。在這個認知的基礎上，嚴復乃提倡言論思想的自由及伸張民權，對君主立憲的政體也表示贊揚。君主立憲失敗以後，嚴復認為中國要邁向現代化，就必須鞏固政體與團結力量，而此時惟有專制政體方可為功，「以不佞私見言之，天下仍須定於專制，不然，則秩序恢復之不能，尙何富強之可跋乎？」而提倡自由、平等與民主，勢將造成分歧和無政府的狀態，並且導致反革命的局面。嚴復在給熊純如的信函中說：「今日政治惟一要義，其對外能強，其對內能治，所用方法，則皆其次」。這幾句話，明白宣示了嚴復對政治制度發展的基本態度，也是他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演化論信仰的一個延伸。他晚年之所以闡揚儒學，而有回歸傳統的濃厚跡象，甚至組織「孔教會」，請願以孔教為中國國教，也是因為他相信，儒學在中國往昔歷史中，曾代表一種民族的感情，因此在「軍國社會」來臨以前，可以作為維繫道德的一種標準。蓋「宗法之入軍國社會，當循途漸進，任天演之自然，不宜以人力強為變遷。」他不遺餘力的闡釋並肯定孔孟之道，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意理的價值，是因為他眼睜睜地觀察到一個達爾文主義活生生的殘酷世界，科學居然成了帝國主義侵略和殺伐的銳利工具，這一切足以證明西方文明的背勃人道精神，勢必趨向沒落。嚴復痛苦地說：「文明科學終效，其於人類如此。故不佞今日回觀吾國聖哲教化，未必不早見及此，乃所尙與彼族不同耳。」又說：「不佞垂老，親見脂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倘若說嚴復這個見解是代表一種保守，甚或頑固的思想，那麼我們試讀史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O.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看這本書裏預言西方文明的「毀滅」，以及「歐洲

文化死亡」的宣告，是否也可以判定「西方的沒落」所代表的，也是一種保守，甚或頑固的思想呢？

(五)

我們以極有限的篇幅，介紹了史華茲在其「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一書中，對嚴復生平思想一些分析性的片斷的見解。該書無疑代表了美國研究思想史的學者，探討中國思想家的一定成就和學院派的謹嚴的水平。但是我們幾乎很難同意，史氏在該書中的某些結論性的推證。我們且先回到該書的一個基本觀點：不僅嚴復早期思想裏的權威主義、自由與激進的色彩，可以判定是從西方來的；就是嚴復晚年的政治保守趨向，也仍舊守住西方的觀念，並未回歸到中國的傳統。史華茲在結論一章中，更把這個觀點加以擴大闡述，認為像嚴復這一類型的人，他們接觸西方的目的，不外乎是尋求社會、政治或意理的理論結構，一方面感覺自身傳統文化過於束縛人力的發展，另一方面又認為西方文化只注重強者而摒棄弱者的觀念，是不恰當的。但是，對嚴復來說，強者就應該生存，弱者則必須淘汰，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也符合社會達爾文主義。他認為西方強而東方弱，那麼東方自然就要接觸西方，向西方學習，但須以西方的立場來觀察西方。他得自斯賓塞的觀念，心中也融合了達爾文主義與自由主義。這是史華茲對嚴復思想分析的最後論斷。

筆者對史氏上述觀點未敢苟同。基本上筆者認為，從資料基礎上，我們明顯地可以歸納嚴復的思想模型，乃是一種中庸之道。即以達爾文主義的意理結構而論，他在「天演論」的譯述過程中，既要援引赫胥黎的學說，又要根據斯賓塞的理論，那麼，他就必須面臨「自然之變」與「人為之變」，「自營」與「克己」，「意志論」與「宿命論」，「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鬭爭」與「無爭」等等矛盾。做為一個達爾文主義者，如果嚴復不一邊倒地走向斯賓塞，或走向相反的赫胥黎，那麼，他就必須進行這兩個學派理論性的統合工作，以消融其對立的矛盾。嚴復的學術處境，只有兩條路可走，別無抉擇，而他終於選定了統合的路，於是他必然要走向中庸之道的儒家，這是邏輯的發展，嚴復是不能例外的。

從這一線索，我們可以更深切的剖示，嚴復雖然早在一八八一年已經讀了斯賓塞的著作而深所嚮往，但他却又捨棄斯賓塞的「綜合哲學」而改譯赫胥黎的「天演論」。史華茲的解釋是，嚴復的動機是避難就易，因為斯賓塞的「綜合哲學」的內涵太艱深，太廣博，而且篇幅浩繁，「長凡十集，為論數十萬言」，「其文繁衍奧博，不可猝譯」。然而筆者分析的結果，認為嚴復之所以捨斯賓塞而就赫胥黎，最合理的原因解釋應該是「演化與倫理」一書，真正迎合了嚴復深切的危機意識與當時中國時代處境的特殊需要。嚴復進一步選估計到，斯賓塞式的純自然的淘汰理論，也與中國傳統仁道精神不相容，不像赫胥黎的書中所提倡的倫理觀念之切近符合中國文化思想的基本信仰。很明顯的，嚴復可以說完全是在一種危機哲學的意理基礎上翻譯「天演論」的，因為赫胥黎提出了對付種族滅亡危機的應變的方法，就是他所謂的「人治」(Horticultural process)，或「人為」(Human action)，也即是以倫理控制的方法，充分發揚每個人克己的意志力，將一切「智」、「德」、「力」，以及一切合羣的力量，集中起來去抵抗天然淘汰的公例，以建立一個道德崇高的社會，尋求人生最高的幸福。這點很切中適合中國傳統「天人合一」，「人定勝天」等的信仰和論調，也密切銜接了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的危機意識和應變的期待。因此，筆者的結論是：嚴復的思想歸宿，即非由激進而保守，而終其一生，其思想模式，也始終保守住中庸之道的儒家觀念，並沒有轉向西方傳統，更沒有一邊倒地歸皈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嚴復之服膺演化論，是基於危機感的愛國情操和政治覺悟。處在那樣一個危疑震撼的時代環境，他迫切地企圖要建立一種綜合的危機哲學，任何能挽救中國危亡的學說，能解決認同危機的思想理論，都是他要探究和綜合的註腳。他的思想模式是可以用來範例近代中國其他達爾文主義者的一種典型。

(六)

另一點值得商榷的是史華茲關於「有機體」思想的論述。他認為斯賓塞的「一元論」與「絕對宇宙論」，極符合中國的思想，特別切近於道家的思想。他說在中國文學中也有這種觀念，即將君主譬喻為首，而臣子為

手足；在道教或中藥的觀念裏，這種有機的譬喻更是常見，以身軀為骨幹，各器官相配合，如同一個國家之中，其下沒有許多部門，只不過實施的對象為人體，而不是國家或社會。史華茲認為，儒家強調個人是社會的一份子，但是此處之社會，意指社會結構而言，並非指「社會有機體」，而天下也不是一個封閉的有機結構。儒家這種觀念和以生物學譬喻的有機體的立論不同。史氏這點結論也是我們必須加以澄清和辯駁的。

我們不妨援引李約瑟在其「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一書中，有關的見解，做為論證的基礎。我們相信中國傳統的文化特質之一，是「天人合一」的有機自然哲學。據李約瑟所見，中國思想上的重要因素，對於現代歐洲思想貢獻最大的，乃是「自然有機體論」(Natural Organism)，或「自然有機概念」(Organic Concept of Nature)。李氏很明白地指出這種思想體系乃是中國二千多年的哲學思辨的最高綜合，由周易發端，直到宋代的理學而達到最高峯。其中貢獻最大的當推朱熹，他把儒、道、釋的思想融會貫通，完成了哲學的綜合。他所提出的自然有機的「普遍模型」(Universal Pattern)說，是以「理」(組織)和「氣」(物質——能)的概念，來說明自然論的宇宙觀，也即說明整個宇宙的概念乃是一種有機的統一體。

李約瑟進一步說，現代自然科學，到了由機械的宇宙論進步到「有機」哲學時，世界學術已突然踏入達爾文(Darwin)、菲理沙爾(Frazel)、巴斯德(Pastur)、斯柏曼(Spemann)、浦郎克(Planck)和愛因斯坦(Einstein)的時代了。而這一思想發展的線索，却可以由懷海德上溯到萊布尼茲，而萊布尼茲的有機觀念，則還是淵源自朱熹。這樣看來，他們的有機自然主義的思想靈感，以及某些歐洲近代自然科學的理論基礎，還是深受莊周、周敦頤和朱熹的影響。李約瑟對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機自然主義的論述，我們認為是極博洽而精闢的卓見，也是西方學者所彌感困惑的一條文化思想發展的線索。如果我們說易經和理學，是儒家思想主流中的內涵之一，那麼，我們便必須承認儒家思想的有機性了。這一點也是我們應該提出來申論，併供給史華茲一點參考和印證的。

光緒二十九年，嚴復接受了他的弟子熊純如的付託，開始評點「老子」。這一年，「穆勒名學」前三部和「社會通詮」都已譯畢，「羣學肄言」及「羣己權界論」也出版了，而「法意」則正在着手翻譯中。史華茲認為，嚴復之所以評點老子，乃是將其運會觀與哲學觀作一概括性的說明，因此，嚴復一方面翻譯，一方面也研究老子。他的目的，乃令國人在西潮的衝激下，恢復民族自信心。嚴復發現老子的思想包涵了「民主」與「科學」的觀點，同時與斯賓塞的形上學極其相似。斯賓塞之「不可知」與老子的「道」，同樣為萬物之始，不可落言詮。而且嚴復也察覺，如同斯賓塞於「第一原理」所言，老子也表示宇宙萬物都相互對立，而歸於「道」，至於「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觀念，更符合了達爾文的理論。不過嚴復也批評老子的原始主義，他學「道德經」十八章至二十章為例：「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等文字，認為是反對人類文化發展的論調，即是反對進化。嚴復在評點上說：「老子此三章之思想與現代哲學迥異，蓋由質入文，純入雜，乾坤入未濟，乃是自然的演變。若謂歸真返璞，即如強迫溪河倒流，乃倒果為因，反自然亦反道。今日文明，以自由為重，在此原則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大同之治由而生焉。」，顯然，老子的觀念代表了一種宿命論，即反對宇宙人類的進化。史氏從而下結論說，晚年的嚴復，已經瞭解靜態的，無為的「道」，僅足以阻礙中國的進化，無法導致富強。但是，倘若純就思想而論，「道」的觀念，在嚴復一生思想中所佔的份量還是相當重大的。

我們承認史氏在本書中，對嚴復評點「老子」的分析和闡述是很博洽而精闢的，同時他引證了李鈞瑟論道家思想的見解，也提供了一種彌足深思的比較研究的視野。不過我們要遺憾地指出史氏在參證資料時，沒有達到完備的境界，因為，嚴復繼評點「老子」之後，又評點了「莊子」和「王荊公詩」，合稱「侯官嚴氏評點故書三種」彙刊行世，這個版本和評點「莊子」及「王荊公詩」兩種資料，顯然是史氏寫著本書時所未及見的，在史學研究的方法上，尤其在資料基礎上來說，可能是一項重大的疏誤和缺陷。評點「老子」僅一冊，而評點

「莊子」共四冊，評點「王荊公詩」則多達六冊，足見後二者份量之重了。雖然就評點的內容看來，後二者在質的方面也許相當粗疏，沒有評點「老子」那樣系統而精密，但片言隻字畢竟均能代表嚴復晚年成熟的最後見解。倘若史氏當時能及見這批珍貴的資料，並且把評點三書的內容，進行更博洽的綜合解析和評述，相信將更有助於本書對嚴復思想研究的透澈性和完整性。

(八)

最後，筆者還希望附帶地指出一項重要的事實，也許是幾乎所有嚴復生平傳記的研究者或寫作者所共同忽略，或未曾給予適當的評估和應有的重視的。根據年譜及其他多種資料顯示，嚴復晚年患了極其嚴重的氣喘病。大概從民國元年「冬病喘嗽」開始（據學衡二十期與態純如書札節鈔補第五），我們從資料基礎上即可推測他因氣喘病的日趨惡化，在其後十年間所深切感受到的身心雙重的煎熬和痛苦。即使是一個天縱英雄，我們也不可能苛求他超越生物規律所設定的極限。我們明顯看到的那個入民以後，生機大量剝落，意志日漸消沉的老人，也即是一般史家以「保守」或「頑固」來形容其晚年思想和情操的那個智者，實有其生理上的嚴重背景。

當我們從年譜及其他更親切而直接的資料中，看到「至冬，氣喘常作」，「冬，氣喘又作」，「冬，氣喘大劇」等描述，又知道他如何以疲困和虛弱之軀，為逃避病魔的糾纏，乃僕僕風塵，輾轉於北京協和醫院，東交民巷法國醫院及上海紅十字醫院之間，要求診治而竟不可得，又加上經濟生活面臨了困窘，真是一個貧病交迫的老人了。有一段話自寫他這時期的苦況說：「生計頗窘，自謂得粗了，即亦聽之，不復向胡奴乞米……老境侵尋，生趣漸薄。」這樣的處境，使他「欲續譯穆勒名學，云終必成之」而「未果」。年譜時見「秋杪赴閩辟多」，不是為了度假圖閒適安逸，而是迢迢南返福州家鄉溫暖氣候的地帶養病，冀求減輕痼疾的惡化。民九南返，即不再北歸了。那年夏天，閩中鬧了一次洪水，嚴復還很憤慨不平地說：「此等名為天災，而自科學大明，實皆人力所可補救，所恨吾國財力悉耗於率獸食人之中，而令小民處處流離，甚可痛也。」語氣間依舊彌

漫了正義的情操，橫溢着人道主義的博愛精神。

筆者無意於此，從生理學或醫學上提供更深入的分析，來解釋嚴復所謂「晚年趨向保守」一類史評的內在潛因。早歲的昂揚卓越和晚年的困頓淒涼，正好刻劃出一個時代悲劇的對照，這種對照所反映的普遍意義，不再是嚴復個人的了。春蠶吐絲至死，蠟炬燃成灰燼，嚴復一生為苦難的中國竭盡了天職，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晚年雖然被痼疾折磨得有如「槁木死灰」，却實踐了老莊「安貧樂道」的人生哲學，「心志恬然，委心任化」，對那個亂世所給予的冷漠的還報，無所怨尤。半個世紀以後的史家，又何忍基於某些意理的固執與偏見，僵硬地以「保守」、「頑固」，甚或「反動」等殘酷的字眼，來批評，並且嘲諷這位為中國近代思想的啓蒙而散精勞神，鞠躬盡瘁的偉大智者呢？

唱片

書評書目社總經銷

中國現代民歌集 • 余光中詩 楊弦曲 五〇元

中國當代音樂作品 (四大張・附說明書)

賴德和主編

二五〇元

西出陽關 • 楊牧等詩 楊弦曲 五〇元

陳達和他的歌 • 陳達唱 八〇元

楊弦的歌 • 楊弦主唱 (錄音帶) 一〇〇元